



人文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2

齐鲁晚报

2022年6月10日
星期五

思想之光
——
华文
——
文字
——
魅力

□美编：陈明丽
□编辑：徐静

记者 张向阳

规模： 兵分两路收获颇丰

一说起楼兰，人们自然会想起唐诗中的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“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”等千古名句。关于楼兰的记载，最早见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楼兰是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，作为丝绸之路要冲和枢纽，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，为历代中央政权有效管理西域、维护丝绸之路安全畅通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楼兰曾经辉煌一时，直到公元4世纪左右，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彻底消失，只留下诸多神秘的传说和未解之谜。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文化遗址，一直以来楼兰也是西域考古和丝绸之路考古的焦点。自楼兰古城遗址被再度发现以来，它的兴盛、衰落，成为国际学界最为关注的考古话题之一。

新中国对楼兰遗址的考察，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。当时在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侯灿，参与了对楼兰遗址的考古调查。对很多人来说，侯灿是个陌生的名字。他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、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，长期从事新疆考古与历史文化的研究，先后出版过《高昌楼兰研究论集》《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》《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》《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》等著作。

侯灿1936年出生，1960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新设立的“考古专门化专业”，是新中国培养的较早的一批考古专业人才。1973年，侯灿被调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，开始整理吐鲁番出土墓砖，成就了他对于吐鲁番研究的学术贡献。1978年，随着考古队伍的调整，侯灿被调入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，开始了他后半生最钟情、最牵挂的楼兰考古与研究事业。

1979年中日联合拍摄“丝绸之路”纪录片，带来了新中国楼兰考古的契机。当时，中央电视台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工作队，进入楼兰遗址开展考古，穆舜英、王炳华、王明哲、侯灿等学者参与了这次考古工作。1980年，经过前一年的两次勘查，考古队兵分两路开进了茫茫沙海，考古所的侯灿是西路负责人。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沙漠考古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属于科学意义的楼兰考古。

这次考古工作包含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、楼兰古城、铁板河墓地、楼兰城郊古墓葬的发掘等，出土了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“楼兰美女”干尸。楼兰古城，如今只剩残缺的佛塔、城墙、宅院和三间房遗迹，被千年风沙吹拂的堪称奇异的雅丹地貌。考古队发掘的文物折射出楼兰作为丝路明珠的繁盛时光：这里有大量玻璃、海贝、海蚌、珊瑚；铜币集聚了西汉五铢、东汉五铢，王莽大泉、货泉，还有阿富汗地区的贵霜王朝钱币。

数据： 纠正斯坦因的误差

早在20世纪初，以斯文·赫定和马尔克·奥莱尔·斯坦因为代表的一批批所谓“外国探险队”，从楼兰盗走了大量文物。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，开始对楼兰的发掘，“收获”了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简牍文书，并运到国外。1903年，他的纪实性行记的英文本《中亚与西藏》出版；此后数年间，他又编写了八卷本的《1899—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》，引发了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对楼兰和罗布泊的兴趣，也引来了打着各种旗号的挖掘者。1905年美国的亨廷顿探险队进行发掘；1906年，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奔赴楼兰，系统调查、发掘了楼兰地区大部分城址和墓葬。其实，楼兰的宝藏哪里可能尽入斯坦因囊中。他走后不久的1909年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发掘楼兰古城，获得证明海头与楼兰所在的“李柏文书”。1914年斯坦因再度到此，又有所获……

我国科学家到楼兰考察，开始于1927年。当年随中瑞(典)西北科学考察团来楼兰的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和地理学家陈宗器，曾先后数次到达



侯灿先生于楼兰(1979年12月3日)

迟到的楼兰考古报告 还原最真实丝路古城

今年春天，侯灿先生记录楼兰考古的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》在迟到35年后正式出版，这也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楼兰古城考古调查的详细报告，尽管姗姗来迟，却依然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黄沙漫漫，大漠孤烟。42年前的1980年，一支由士兵、考古人员、牧民组成的特殊队伍艰难行进在新疆罗布泊的茫茫沙漠中，他们要对丝绸之路上神秘的楼兰古城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考古发掘。



远处的“三间房”是楼兰的象征。



楼兰出土的文物

罗布泊北岸考察，发掘遗址，出土了70多枚写有明确的西汉纪年的汉文木简，发掘了汉代烽燧遗址，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铜器、铁器、漆器、木器和骨、石、陶器，以及丝、麻织品残片，这在寻找楼兰的印记里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。

1979—1980年的这次考察先从空中和地面探查进入楼兰的道路，1980年3月下旬才分东西两路进入楼兰。这次科学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的合作，再加上后期侯灿先生的细致整理、人类学家的参与、测年手段的引用等，

都使得楼兰考古发掘工作成为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。除了新疆考古所之外，新疆气象局、新疆地理研究所的加入，使得勘察、清理、图片制作、修复清洗较之以往都更为专业。

对楼兰古城的考察，为楼兰古城的地理位置和规模、从汉到晋的历史演变、形态布局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，揭开了这个西域古国的神秘面纱，更正了既往的一些说法。中国考古队首次为楼兰测量了精确数据，包括经纬度、水渠道路、建筑遗址等数据，纠正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粗率记录。

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》书中记录楼兰古城的位置在东经89°55′22″，北纬40°29′55″，其规模按城垣复原线计算东面长333.5米，南面长329米，西、北两面各长327米，总面积为108240平方米，基本上呈正方形，借此纠正了斯文·赫定在1901年、斯坦因在1906年和1914年测定的楼兰古城位置与规模数据误差。考古队还采集到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与魏晋时期的文物，特别是出土了60多枚汉文木简文书；发掘了城郊的平台墓地和孤台墓地，确定墓葬的时代是两汉时期。侯灿先生在曾被外国人盗挖过的地方做二次发掘时，还有新收获。比如他在斯坦因发掘过的MB1、2的墓葬中，又清理出大量珍贵文物。

成果： 描述丝路古城变迁

今天，打开这本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》，仿佛跟随当年的考古人员一起走进楼兰古城：枯倒的胡杨树、残破的土城墙、干涸的古水道，官署佛塔、烽燧墓葬，其间错落的陶器、布片、铜镜、铁钉、戒指、骨雕……古老的遗迹再现了它当年作为丝路绿洲繁盛的景象。这部考古报告还原了楼兰人的生活场景——他们临水而居，种植果木，耕作商贸，建九层佛塔，绘斑斓壁画，更把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模式扩展到此间。

出土的木牍竹简，让我们窥得楼兰古国之一斑，提供了破译历史谜团的钥匙。那一次他们共发掘出65枚简纸文书，其中木简文书63枚，纸文书2枚，有纪年的文书4枚，从泰始二年(266年)到泰始五年(269年)。侯灿根据考释得出结论，西晋司马炎执政时期对楼兰进行过积极的建设，楼兰古城的最后形制应该是完成于那个时期。

这些文字无声描述着丝路古城的变迁，让我们触摸到悠长的历史印记：自石器时代起，楼兰就依傍孔雀河的下游聚集人类，两汉形成丝路孔道，魏晋成为西域长史的驻地，后来随着环境的变迁，消失在浩瀚的历史云烟中，只留下一座神秘的古城……

当年，抖掉身上的沙尘，侯灿回到乌鲁木齐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考古报告的撰写工作，到1987年就已经完成。报告中对调查发掘经过，考古发掘所得文物都做了详细的描述，并对照前人发掘的同类物品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，图文并重，还有大量线描图和数据统计表，是我国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。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，而侯灿先生也于2016年去世，成为其终身遗憾。

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介绍，侯灿曾在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》完成的当年，就寄给出版社商议出版事宜未果，此后也一直

取，这是他一桩未了的心愿。侯灿是孟宪实年轻时的学术引路人，他们在新疆共事过多年。孟宪实还记得，当年侯灿先生在整理出土墓志资料时，将其一条一条摊在床上进行整理的做法，深深感染了他。

侯灿与妻子吴美琳退休后从乌鲁木齐搬到成都，又来到苏州，最后两人在上海定居。侯灿去世后，充分认识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》重要价值的孟宪实，找到了有意向的出版和出资方，又联系了侯灿的爱人吴美琳找手稿，但过去的时日太久，吴美琳怎么也想不起家里有这部手稿。直到2019年，孟宪实在发表的一篇纪念侯灿的文章中再提此事，其中的细节突然提醒了吴美琳，手稿等学术资料都存放在苏州儿子家中几个大纸箱里。她随即回到苏州老房子，把尘封多年的纸箱全部打开逐一查找，终于找到了那本厚厚的手稿。这些手稿还是当年吴美琳帮着侯灿誊抄的，“因为太久没人提起，所以不记得了。”

终于，在迟至35年后的今天，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》由凤凰出版社出版。

话语权： 为楼兰考古发出中国声音

新中国成立前，楼兰研究的话语权基本在国外。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》的编写，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发出的最强音。

孟宪实教授回忆说：“我不止一次亲耳聆听侯灿先生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。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重要，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。斯文·赫定、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，楼兰考古研究，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。”

虽然斯文·赫定、斯坦因的著作中都有关于楼兰的发掘记录，但侯灿主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价值和意义最大的一次，填补了空白，使中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。在层叠的历史碎片中，更为系统科学的工作无疑能还原出最贴近真实的楼兰图景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研究员认为，这份报告是难得的研究性报告，资料全面、描述准确，器物概念清晰，是此前外国人在楼兰盗掘所刊“报告”难以比拟的。

这部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》揭示了侯灿先生的独特发现与判断，比如特别关注前人未涉及的楼兰城的用水问题；指出斯坦因所谓“土台”实际为雅丹地貌；清理了斯坦因所遗漏的东北小佛塔遗址，发现了五彩斑斓的佛教壁画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南道佛教和佛教艺术的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信息；对楼兰东汉时期五铢钱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尽分析；对楼兰城址中细石器的使用进行了详尽考察，判断时间跨度很长，一直到历史时期，是对楼兰地区石器遗存的一个新的认知；对简纸文书的专门研究；谷物遗迹的发现也是斯坦因所未提及的，对研究楼兰当时的屯垦(经济)具有重要意义。不同于“探险者”对宝藏的唯一兴趣，这次科学考古更关心楼兰的完整历史，诸如史前人类活动和生业经济。比如，城里的麦子标本就为研究中国小麦起源提供了新信息，其中一段小麦穗轴上还保存着一朵完整的小麦花。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许多桃核，这表明当时古楼兰地区的自然条件温暖湿润很适宜桃树生长。

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以报告中的多枚戒指、铜镜、漆器为例，说明了其对研究丝绸之路贸易、中国文化西传等课题都有重要价值。他还特别提及报告中出现的一枚贵霜钱币，大概是在最东边发现的贵霜币。因为贵霜最兴盛的时期相当于东汉中期，恰恰是汉文史料中缺少记录的，这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、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与贵霜帝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。

“这份报告为楼兰考古发出了中国声音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记载的缺失。”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在接受采访时说。尽管迟到了35年，却如孟宪实教授在《后记》中所言：“楼兰考古……侯灿先生主笔的这部报告，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。”